

社会关怀与人性良知的交融

——论邓宏顺长篇小说《贫富天平》

马为华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邓宏顺是一个具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贫富天平》的根本审美优势在于以一种切实的感性力量显示深刻的思想主旨;宏大叙事和生活氛围的结合,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在具有充分理想性的同时也显得非常真实可信,这样既彰显了时代精神,又充满着审美的亲和力。

[关键词] 《贫富天平》;社会关怀;人性良知;宏大叙事;生活氛围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5-0005-03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Concerns and Human Conscience

——On Deng Hongshun's Long Novel *The Scale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MA Wei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Deng Hongshun is a writer with deep life foundation and strong reality concerns. His long novel *The Scale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is very excellent. The fundamental aesthetic advantage of this novel is the profound ideological idea manifested by the perceptual power. The combination of grand narration and the atmosphere of life makes th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very ideal and authentic, which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also full of aesthetic affinity.

Key words: *The Scale between the Poor and the Rich*; social concern; human conscience; grand narration; the atmosphere of life

邓宏顺是一个具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强烈现实关怀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贫富天平》的根本审美优势,在于以一种切实的感性力量显示深刻的思想主旨,其中体现出诸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

首先,从整个文学背景的角度看,《贫富天平》表现出一种宏大而深厚的社会关怀意识。

新时期以来,“纯文学”诉求长期成为文学创作的方向,强调文学自律、自足、独立,放弃和告别宏大叙事,选择个体经验和内心世界作为最主要的表现对象,这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版图和风貌。这种“纯文学”诉求确实曾经使文学得以从政治、社会的直接辖制下解放出来,也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但进入90年代新的时代文化语境后,很多作家还

是凭借着惯性,将宏观叙事当成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毫无分寸地避讳和忽略,大量地聚集在“个人”“内心”的道路上,而且越滑越远。结果,越来越多的作品因为切断了生活的洪流、切断了和身边行进的历史进程的对话,而变得气度狭小、苍白失血,原创性也随之变得稀薄。正如有评论家指出的那样:“由于某些作品把这种‘自足的内在’和消费意识形态的私人性、物质化、欲望化相联系时,这种‘文学的内在性’同样暴露出抽象性的弱点,因为在这种联系中,‘内在性’与‘私人的欲望’具有某种同构意义,成为‘个人’的自言自语,也就弱化了思想能力在作品中的呈现”^[1]。在为数不少的作品中人性仅仅被简化为欲望,“人性中的欲望化因素在上

世纪90年代的许多作品中就已经被作为文学的重要内容得到重视。但是在新世纪以来的某些作品中,这种欲望化更多地与‘日常生活的享乐’联系在一起,欲望往往呈现出的是物欲、情欲的内容,并且文学的叙述和想象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忽视了现实诸种力量和因素在‘人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1]。学者陈思和也曾经指出,在上世纪90年代,“由于大多数作家对市场经济大潮缺乏精神准备,采取了回避当下生活的态度,有的从历史的角度继续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有的则以更加遥远的历史题材寄托个人情怀,淡化地处理个人理想与现状的尖锐冲突,既使一部分新生代作家与当下生活保持了近距离描写,也大多局限在个人的狭窄生活空间”^[2]。在一场场欲望的舞蹈中,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中本应该千姿百态的“个人”形象却坠入了面目可疑而又模糊的千人一面中去。

从这样的文学背景来看,《贫富天平》显得相当的难能可贵。小说以艺术家的勇气和思想力量,直面当前社会公共领域最为关键的贫富差距问题。小说封底的话“穷人、富人:昭彰的鸿沟,潜藏的落差,谁来做社会的天平?”就既是尖锐严肃的发问,也是作品叙事的聚焦点。小说以新到任的白鹤市委书记高南翔的一系列工作为引线,完整地勾勒了一幅当下工业、农业、商业等各个领域的全景画卷,并将贫富分化的尖锐性矛盾置于这个社会生活的全景图之下。作者借高南翔之口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等,其实都是绞成一团的”,贫富分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哪一个或几个阶层的事情,它实际上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正是这种目光敏锐而视野宏大的问题意识,赋予了作品沉甸甸的质感和掷地有声的思想含量。读者随着对作品的阅读展开对贫富分化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小说也就从根本上实现了用文学智慧参与社会进程的使命。

其次,从同类的社会问题题材创作角度看,《贫富天平》表现出一种相当清晰的理性逻辑和格外透彻的思想眼光。

毋庸讳言,我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加剧等问题也成为了近年社会公共事务领域最引人关注的变化之一。令人遗憾的是,面对这充满了变化、挑战和矛盾的时代环境,不少作家未能从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寻找到一个坚实、有力的价值立足点,既对社会历史的发展缺乏透彻的认识和必要的信心,自身也充满了迷茫,结果,他们的创作就难以对贫富分化等社会矛盾进行切中要害的理解和清醒坚定的阐释,以至在作品中,要么充满

了痛恨为富不仁、为官不正而又不无艳羡的“恨世情结”,很多官场黑幕小说就是其中的典范;要么满足于展示一个被苦难与泪水包裹的、单向度的底层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义愤,或者直接对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本身充满了紧张、抗拒甚至仇视,很多所谓的底层小说都遵循着这样一种叙事套路。不管是忧伤还是愤怒,这类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将复杂的社会问题道德化的局促甚或偏执。

这类作品所表现的忧虑自然是真诚的,在文学史上这类表达我们也并不陌生。从《诗经》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到鲁迅的闰土形象和当下文坛的“底层文学”,我们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到一条悯农、仇富的文学史线索及其背后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的精神传统和文化资源。但是,在这强大而源远流长的审美传统背后,实际上或多或少地暗藏着农民意识的狭隘和保守,因而无法从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把握现实的全局。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因此不发展经济?情绪化地对待经济发展是不是文学表达的唯一出路?就成为他们无法解答的诘问。这样,思想的透彻也就无从谈起。

《贫富天平》的审美则是别致而令人欣慰的。小说的关注视野没有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个人的命运,也没有停留于道德化考量的层次,而是首先以充满了历史理性的态度承认,贫富分化“这种社会现象并不新鲜,世界各国的历史上不知重复了多少次”;进而鲜明地提出,领导阶层既不能“劫富济贫”,也不能放任“为富不仁”的现象,这样才能使整个社会不致于最终落入“同穷”或者“共穷”的境地。于是,历史的方向就显示得相当明了:社会经济必须发展,但绝对不能以牺牲道德、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为代价,领导阶层就正是要承担起做整个社会贫富天平的功能。小说引用古人唐甄的话指出:“提衡者权重于物则坠,负担者前重于后则倾”。这种阐释思路,相对于“社会发展必然要引起道德堕落”之类的判断,就显得既清晰又透彻,能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具有一种大风范、大气度,显现出近年文坛上比较罕见的宏大叙事的气象。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叙事的焦点要么在于底层的苦难,要么在于权力斗争中的黑暗与阴险,而《贫富天平》则独辟蹊径地聚焦于正面领导干部形象的塑造,这种选择既出自于作家对现实独特到位的关照和思考,也出自于作家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殷切召唤,因为文学本来就应探讨一种可能性和理想性以及这种理想性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

《贫富天平》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既有高风亮节

又有能力的干部形象,从而将对于宏观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坚持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有机地融汇到了可感、可触的人物形象性格内涵之中。

小说里对于一系列好干部形象的塑造,使小说的审美境界充满了一种历史正义的力量。从满腔正气、能力和魄力兼具的市委书记高南翔,到长期默默无闻坚持以化名资助贫苦人家孩子上学的市长万世耿,再到20多年拿自己的工资替农民买树苗、整日蹲在山上助民脱贫的基层干部周天好,作者塑造了一批做好事、做实事的干部。其中体现的将工作能力和道德品质相结合的干部衡量准则,既使整个小说显得基调明亮、昂扬,又与作者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相适应。而且,因为具有这种宏远、深切的社会关怀视角,“贫富分化”也就没有衍生成覆盖全局、大夜弥天的终极性因素,而只是干部们在工作中所要面对和最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高南翔上任伊始,就面临着一种尖锐的挑战:放任皮革苏,就意味着富人不仅占据了经济上的优势,而且能凭借这种优势侵蚀社会公共领域内其他人的权利,任其发展,必将导致社会道德的整体没落;处置皮革苏,又意味着整个白鹤市的经济陷入困境。面对这种纠结的状况,高南翔没有仅仅从利益出发偏袒富人,也没有从道义出发打压富人,而是用一种非常中正、务实的态度,通过从根本上解决白鹤的经济问题,来维护法律、道德的尊严和老百姓的利益。高南翔正是老百姓心目当中所期盼中有能力又有正义感、道德感的好干部典型。

《贫富天平》接续了问题小说的传统,却又超越了那种只提出问题而不给出答案的传统叙事模式。小说所写到的问题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时期的作品也非常类似,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权衡和处理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但作者不再仅仅从道德诉求角度泛泛地呼吁“分享艰难”,更指出了领导阶层在其中作为天平的关键作用,并将这种历史的要求落实到一群洋溢着时代精神和人性美好的干部身上,整部作品也就显示出一种把握了历史与未来的恢弘气度和坚定信心。

同时,《贫富天平》又注重从细部描写、注重生活实感,全景性宏大叙事和真切的生活氛围的结合,使人物形象充分体现一种基于人性的善意和人情的美好。作者笔下的干部们并不是三头六臂、刀枪不入的神仙将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困顿、七情六欲。万世耿市长耿介正直,为了大局却不得不在歪风邪气面前低头,以至他那地处偏僻、简单朴素的家,被他经营出了“世外桃源”的意味;高南翔工作能

力非常强,面对妻子、女儿和同学、朋友时,却又是那么的情深意长。作者将这两位主要人物设计为农民的儿子,体会过普通老百姓生活艰辛的经历,使得他们对老百姓的重视、他们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优良作风,显得不仅仅是从党性原则出发,而且带有深厚的人情意味和人性的善意。地处偏远的借娘屯在高南翔的支持下,实现了几辈人盼望通车的梦想,通车典礼前老百姓自发地送来了当地的土特产,要让每个来参加典礼的领导车辆都不落空地回去,屡屡自称是“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宋大禾带领乡亲给高南翔下跪……这些几乎使人落泪的细节,春风化雨般地营造出了做好官的良知语境。

《贫富天平》在大力塑造一系列好干部形象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人性的复杂,直面了贪官问题。高南翔的同班同学张召鑫作为一个“反面典型”的形象贯穿作品始终,他因为贪污被处以死刑,年幼的儿子孤苦无依的结局以及张母的哭诉,就使得“不贪、做好官”的理念摆脱了僵化、空洞的说教,具有了最基本的警醒人性良知的内涵。这个人物形象的存在使得那些好干部形象更具有了真实性,而不仅仅是粉饰太平的符号与夸饰。

宏大叙事和生活氛围的结合,使得小说的人物形象在具有充分理想性的同时也显得非常真实可信,作者对社会问题的宏大关怀最终落实到了人性良知的基点上,从而既彰显了时代精神,又充满着审美的亲和力。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到今天的小说,大多都是以开掘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阴暗显现自己的深刻,《贫富天平》则用一种别致的审美眼光照射现实,表达了一个作家对社会及人生深切的善意和殷切的盼望。这部作品中让人感觉了一种堂皇的正气,作品里充斥着对真善美这一最质朴的文学审美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几乎到了单纯的地步,这种单纯和质朴使得整部作品有着举重若轻、使人如沐春风的美感,这种审美境界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是非常稀缺而又必要的,充满了文学所应该和可能具有的正能量,我们期待着作家能够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王光东. 新世纪文学的思想能力问题[J]. 文艺争鸣, 2009(6):1-3.
- [2] 陈思和. 文学能否面对当下生活[N]. 文汇报, 2002-05-13.

责任编辑:黄声波